

者,如刘美丽、周澈朗、袁玉英等。这一时期,传教士汉文文学的转向还表现为创办了大量面向儿童和妇女的期刊,刊登文学作品,为提高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

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漫谈

荣光启^①

《中国宗教文学史·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作为一项不小的课题,其意在于为学界提供一部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徒(正式皈依/入教的作家)的文学创作图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非常关注在这一课题中个体信仰经验、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学写作自身特征三者之复杂纠结等相关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源于我对当前学界“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不满足。

1990年代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这一课题在学术界开始得到重视,仅是学术专著,国内外(中文)已有十余种,如以下著作:[美]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等。这些研究论著至少凸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1)从文化——文学的维度,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圣经》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促进了哪些因素的改变等重要问题;(2)从宗教/信仰——生命观的角度,以基督教的生命观为参照系,考察和探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生命观、生存观方面的问题;(3)以史料搜集为根基,论证了“中国基督教文学”是一种确凿的历史的存在,“中国基督教文学”有着丰富的艺术形态;(4)从文学文体出发,细致地研究基督教文化、《圣经》的因素对中国文学各种文体的影响,考察基督教文化、《圣经》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叙事和语言、感觉和想象等方面的新质素;从汉语的发展角度,考察《圣经》的翻译与白话文运动之关系。

不过,相关著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如下缺憾:(1)大多数作者对基督教的了解,还是一种笼统的“基督教文化”,对《圣经》缺乏足够的熟悉和一定的理解,对神学范畴内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对教会史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语境内的中国教会,更是显得陌生;缺乏对基督教信仰足够的了解,我们很难厘清作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轻率地比附。(2)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受基督教文化或文明的影响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对这种影响在文学中的表现的描述上,这种文学研究是不是缺乏思想的深度?(3)在“思想的深度”这个层面,确实有作者开始思索现代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但是,若无一定的神学素养和对宗教信仰的真实体会,在这个层面很难有深度;而有一定神学素养和信仰经验的基督徒学者,在涉及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时,有时显得对这一语境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熟悉。此外,中国的基督徒学者,多属新教的福音派,从基要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学问题,会带来一个后果:我们容易辨别一位作家的基督教信仰的程度与真伪,但若不考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况,容易将信仰经验与文学表达之间的纠结简化,也对具体历史境况中的作家缺乏应有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忽视“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课题中,特殊历史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给个体信仰带来的言说困难及这种言说本身的复杂性;(4)尤为重要的是,有信仰经验/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作

^①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家与未皈依基督教的作家,在生活态度、生命境界和文学言说上,是有很大的分别的。皈依之前与皈依之后的写作,也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信仰一种宗教,是一个人在生命观、世界观上的彻底翻转,是生命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彻底更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生中最大的事,对一个作家来说,信仰某一种宗教,对其创作的影响其程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现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使基督徒作家的信仰经验之表述,显得极为复杂,我们若不界定其信仰身份,不将入教或皈依的作家与那些倾向或喜欢基督教的作家区分开,具体结合作家的信仰生活和信仰经验来考察问题,很难真正了解这些作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内心;很难解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其信仰经验之表达与文学言说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宗教文学史·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关注重点必然是基督教神职人员、真正皈依者的文学创作,这里边值得注意的有:那些被人忽略的带有基督教仪式特点和间接或直接的宣教目标的文学创作。我想,这也是这部文学史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部分:原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有这样一些作家和这样的文学创作?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中,文学大家多矣。老舍(舒舍予),26岁时于民国11年领洗,隶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后为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在近年发现的一份老舍的佚文中,我们还看到,信仰基督的许地山也与该教会关系密切,曾经参与教会规约的起草。能参与教会规约的起草,表明二位均不是普通信徒。这两位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与各人在教会中的圣职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中国教会史了解不多的人,大约不会知道倪柝声这个名字。但在西方,倪柝声却是世界性的宣教士和神学家。在近年的一份《美国国会记录》中,有西方世界对这位中国宣教士、神学家的介绍:“《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将倪柝声评为20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30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3000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1922年成为基督徒。20世纪30年代,他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40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1952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监禁。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100万本,成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1972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六十九岁。他遗留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有意思的是,倪柝声大量的中英文著作在国内不能看到,但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在美国,一些白人教会用的《圣经》是倪柝声(Watchman Nee)的注释版。

倪柝声作为中国现代教会的杰出领袖,还创作了许多至今流传的圣诗,即使从文学的角度,这些诗歌都是汉语古典美与现代感相结合的特定信仰经验表达之杰作,像《主爱长阔高深》、《我若稍微偏离正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怎没有伤痕?》、《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等等。其中,《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一诗,今日仍被中国教会广为吟唱。他的《有时候是青天》,因其篇幅长,其中诸多个人经验,虽也是“圣诗”,但似乎也可作为教会之外的现代诗来读。

为我们存留了诸多有价值的汉语诗歌文本的基督徒其实不少,有大量的材料等着我们去挖掘。已有学人看到,像赵紫宸这样的神学家兼文学家,对现代中国,不仅在思想精神上有独特贡献,即使在文学上的成绩,我们也不当忽略。赵紫宸1925—1951年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学院院长兼燕大校牧;1939—1940年应港粤区何明华主教之请,携眷去昆明,以该地圣公会文林堂传道一年;1941年7月在同一个礼拜程序中,由何明华先后三次按手,为他举行了坚振礼,派他为会吏,按立他为会长,使他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在华北教区任会长(牧师)。赵紫宸也是诗人,1930年印行过白话诗集,他的诗作多为“宗教诗”。也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职的刘廷蔚,1932年出版诗集《我的杯》,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纯粹的抒写个人宗教、信仰经验的诗集。

20世纪40年代朱维之就看到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他谈论过“中国圣歌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圣歌在中国也渐渐进步了,在中国新诗中自然也该占一席之地……它可以给中

国新诗一个启示,引导新诗走上合乐的路上去……全国圣歌集无虑数十种,每种销行的数目又是任何新诗集所望尘不及的……比较一下,可知中国圣歌在现代诗歌中具有何种势力了——中国新诗底基础,将由圣歌为起点。汉译《圣经》既经由中国新文学底先驱……现在我敢断言:中文圣歌又将为新诗底基础。”

现代文学中,有些文本是出于基督教的某些仪式或宣教的需要。被众人解读为专写自然、童真和母爱,讴歌纯粹的爱的诗人冰心,并不是因为其是女性,很简单地去吟唱爱啊自然啊,她的创作与她的信仰息息相关。相对于鲁迅那样的尖刻批判现实的作家,很多人轻看冰心。其实,信仰经验成就了冰心的文学创作,其文学作品,很多都与基督教的仪式有关。比如她的诗歌、散文创作,来源于祈祷与默想,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灵修方式,在安静的思想中亲近耶稣、默想上帝的恩典,冰心所做的,似乎只是这种信仰生活的记录。在现代以来像《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等教会机关和教会大学的刊物,当代华人教会的《生命季刊》、《信仰与生命》、《举目》、《海外校园》、《芥菜种》等刊物,常常有诗歌、散文诗和散文发表。这些都是汉语文学新鲜的样式和宝贵的资源。

除了圣歌和祷文的创作之外,从宣教的角度,基督教的刊物常常推出另外一些文学形式,像说教文学(也叫布道文学,底本是教会主日崇拜中的“讲道”)、见证文学(以自己的信仰历程,来见证耶稣的救恩和上帝的荣耀)、各样的剧本等。见证文学多为“自叙传”体,或是回忆录,或是小说,有的极为精彩。各类剧本,有的为宗教节日而作,特别是圣诞节;有的则是纯粹的剧本写作,用舞台剧的想象和演出来叙述与《圣经》有关的故事,或作家自己领会的救赎要义,或作家自己构思的从《圣经》衍发出的故事。

圣歌和祷文,是与基督教的仪式相关的文学;而说教文学、见证文学等,则是与基督徒的使命——宣教有关的文学。

《中国宗教文学史·现当代汉语基督教文学史》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视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专门关注中国现当代的基督徒作家的创作,考察他们的信仰经验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言说之形态。此课题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信仰寻求历程,关注在现代历史语境中作家在信仰与历史、文学中的困境,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在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历程中所呈现的丰富形态。

我有一个大概的研究思路:从《圣经》和系统神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现当代基督徒作家其作品中的信仰经验、信仰告白:这些作家对基督信仰的理解与经验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的;从具体历史语境,同情地理解作家独特的信仰表述和对世界的言说:这些作家的信仰经验的言说面对着什么样的因历史环境而带来的困难;立足于文学的本体(文学的本体状态是经验、语言和形式的互动与生成),考察中国现当代基督徒作家在文学言说的经验、语言和形式之互动、生成上,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这些作家,他们在困难的信仰经验和文学的本体必须之间的挣扎,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质素和图景。

本研究目标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督徒作家的创作,即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作家的文学写作状况,考察其文学写作与信仰经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纠结与生成。

围绕这一目标,我觉得此课题面临着如下一些重点和难点。(1)中国现当代基督徒作家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其信仰经验的表达有时相当艰难,在文学形态上,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文学表达的复杂性是值得重视的,对这些复杂性的阐述,如何才能让人稍微满意?(2)基督徒作家到底是什么时候皈依的?皈依的动因是什么?皈依前后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3)文学和宗教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督徒作家,不是宣教士,其作品能否被称为优秀的文学,这里边有信仰经验如何转化为文学艺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作家的精神境界的问题,也是文学技艺的问题。该如何评价基督徒作家与信仰经验有关的文学作品?(4)中国现当代基督徒作家的生命历程与真理寻求,给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其文学创作,使中国文学在经验、语言和形式诸方面,带来哪些新的元素,有什么质的改变?